

◀（上接 4 版）

员):《辽史补注》用我们现在的学术规范来看可能是个未定稿。但放到古代传统下来看,比如欧阳修在生前也把《五代史记》进呈了一部分给皇帝,但是他还在补,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《新五代史》还是一个未定稿,跟《补注》一样。包括我们看司马迁,他很多传也是没写完的,中间给汉武帝进呈过,但一辈子都在补,永远把著书看成一个进行时,即使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。从这个角度看,或许可以理解传统学人的精神。他不会把一部书是否能出版作为著书的终结,而是把这种学术精神一直贯彻在自己的生命里。

徐俊:时代和政治对他这部书的影响大吗?有没有说很长时间做不了,一放放很多年?他 1971 年就回来点《辽史》了,比其他人都早几年恢复工作。

刘凤翥:1966、1967、1968 这三年日子不好过。

李锡厚:“文革”时候他受的冲击不算大。

刘凤翥:下干校,他跟我交流很少,身份也不同,他是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我是“五一六嫌疑犯”。在河南息县,因为请假回家没被批准,有情绪,又被批斗。我们是 1970 年 3 月 14 日下的干校,到年底,所有的二级教授都回来了,像我们所里的王静如,陈述先生是三级,就没回来。陈先生跟我又从息县到了明港。翁独健先生提前回来了,参加了“二十四史”点校工作。可能是翁先生跟顾颉刚先生建议,冯家昇同志已经作古,《辽史》除了陈述没别人能做了。可能是因为这样,才把他从干校提前召回北京,大概是 1971 年春天。回

北京之后,一直住在中华书局,到《辽史》出了以后,还继续住着。我有一回到科学院图书馆借书,碰见陈先生。陈先生说你干脆到中华书局,跟我一块儿标点《辽史》。我说不行啊,我现在还在“五一六”的学习班,还没“解放”。陈先生在中华书局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这一次面。

我虽然是陈先生的研究生,实际上就当了两,1962 年到 1964 年。1964 年我们就到贵州“四清”,回来以后又上门头沟“四清”,后来又是“文革”。到下干校之前,1970 年还是 1969 年,中央发文件说要取缔研究生制度,对没毕业的研究生进行处理,1963 年以前含 1963 年来的研究生一律毕业,1963 年以后的研究生一律结业。我们都是中央文件批准的“毕业”,毕业论文都没有做。

李勉(《辽史补注》责编):那一年就只招了您一个学生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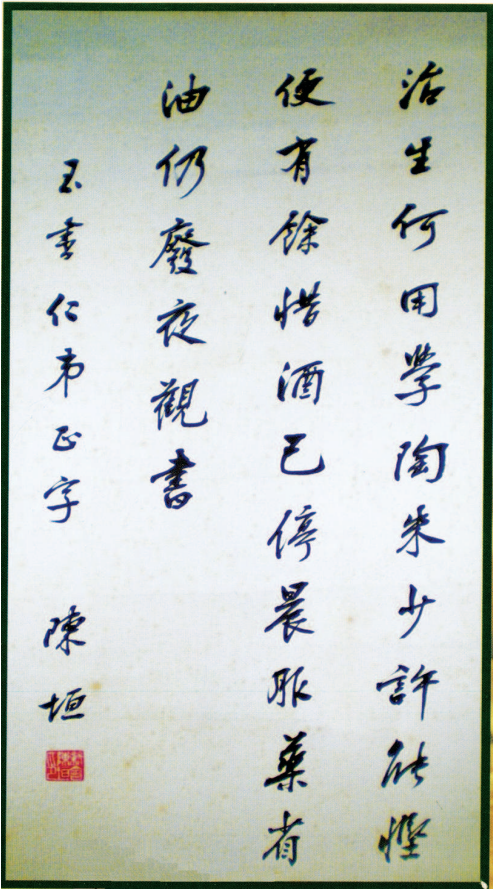
刘凤翥:解放以后,我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。1964 年陈先生还招过一个研究生,叫韩声翔的,一天课也没上过。1964 年来了以后就“四清”、“文革”。后来老家安徽某个地委党校教党课了。那是陈先生的第二个研究生。再后来就是李锡厚、林荣贵他们了。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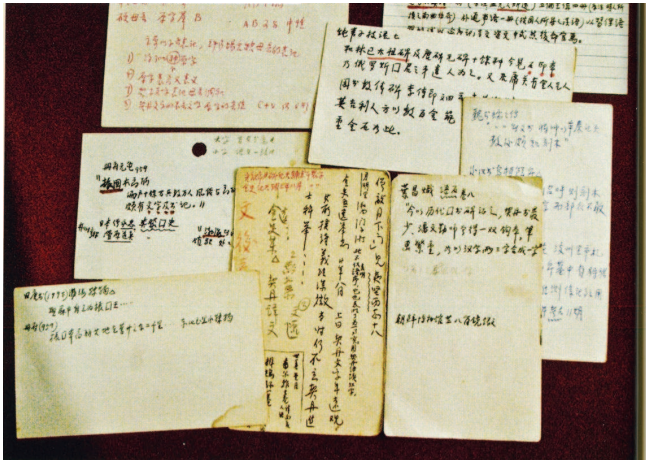
李锡厚:刚才凤翥讲了很多,我也都赞成。陈述先生确实是搞辽史很专注、专一。辽史有几大家,陈述、冯家昇、傅乐焕。像元史,也有三大家,韩儒林、邵循正、翁独健。最后就韩儒林一个人坚持到最后,所以他在元史领域成就最大,培养的学生最多。所以辽史的三大家,陈述就相当于韩儒林。成果最多,培养的学生也最多。这是我说的第一点。

第二点我想说,陈述先生在学术上有继承,也有发展。从继承来讲,我问过他,您做《辽史补注》,在以前谁做过《辽史》注吗?他说《辽史拾遗》就是,清中期厉鹗做的《辽史拾遗》。在那以后不断有人研究《辽史》,冯家昇、罗继祖,更早的陈汉章,都是校勘,也发现了很多问题,写成书。但是陈述先生把乾嘉以来清代学者的校勘成果和《辽史拾遗》补的成果,这两者结合到一起,总其成,做了《辽史补注》。顾颉刚、陈寅恪都给予很高评价。

陈先生学问不止于此。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时讲过,“一代有一代之学问”,要“预流”。所以陈先生做学问,不但



陈垣先生赠字



陈述先生做的学术卡片

有继承,还有发展,不断追赶时代潮流。王国维提倡的“二重证据法”,取地上地下之遗迹,与文献相印证;取各民族文字资料与传统文献相印证;取域外观念跟中国史实相印证。陈述先生一生的研究,“二重证据法”这三条都用了。研究契丹文,凤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现在是国内外公认的第一号权威。陈述先生虽然研究契丹文没有这么大成就,但是很重视,力图用契丹文文献跟《辽史》相印证。另外,用考古资料研究辽史,他的《契丹经济史稿》,那是 1963 年出版的,那时候辽代的考古发现比现在发布的资料少多了,但陈先生也是尽量用。取域外观念来解读中国历史、解读辽史,陈先生早就这样做了。看他的《契丹史论证稿》,解放前马克思著作流行很少,但他从魏特夫的书里学习唯物史观、历史唯物主义。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谈起这个问题,我说您这个书里面讲魏特夫的

理论。他说你怎么这么熟啊?我说我在中学教社会发展史、历史唯物主义,这早就记在脑子里了。陈先生是紧跟时代的。解放后他把这书改成《契丹政治史稿》,就直接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解读辽史。所以陈先生的成就跟他钻研、专注、进取这几方面的精神是密切相关的。有这样一位导师,我们引以为荣。

最后要说中华书局,陈述先生的《全辽文》《辽史补注》都在此出版。《辽史补注》终能出版,陈先生如果地下有知,应该会非常欣慰。

康鹏(《辽史》修订组成员):陈先生带研究生,有没有指定的教材,或者有什么独特的方法?

李锡厚:陈述先生是陈垣先生的学生,特别推崇陈垣带学生的方法。一上来先让我们读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后来指导读《辽史》,给大家看文章、提意见,也就这些方法。我们在北大历史系读本科的时

候,向达先生开一门课叫“史料目录学”,跟陈述先生带研究生的路子也是一致的。邓广铭先生讲治史四把钥匙——目录、职官、地理、年代,目录是最基本的,像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。陈先生很重视这个。

刘凤翥:我刚才讲过,一报到,陈先生就开一个书单:《辽史》《金史》《元史》,逐字逐句去读吧,不上课。当时民族所主管研究生的是翁独健先生,我和史金波同志是民族所的第一届研究生,我们都向翁独健先生“告状”,说老师不给上课。

李锡厚:那一代老先生,不像现在带研究生,会有考核,规定开几门课。那时候北大比较严格,北大本科高年级实际上就是按培养研究生的办法。邓先生讲“西米纳尔”,俄文的“西米纳尔”就是“课堂讨论”(seminar)。他每个礼拜固定时间在家里给学生讲《宋史职官志》《职官志》跟《文献通考》的关系,讲完了让你对照读,你发现什么问题了,写文章,他给你改,邓先生都用红笔批改。陈先生好像没那么严格。

刘凤翥:先生说,研究生啊,不在于讲不讲课,在于要学会一种工作的方法。他说他们在中央研究院的时候,陈寅恪先生也不讲课,就说:“你们学会做学问的方法,学会如何写文章、写书,研究生哪还用讲课啊,就是自己看书,自己钻研,有什么问题来问我。”他不讲课,我们去“告”了他,翁先生也找他,说学生反映你不给学生讲课,你得讲。于是陈述先生就把陈垣先生给他讲的史料目录学的讲义拿来,开始讲五代史料。这些东西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向达先生都讲过了。陈先生还是反复强调要学会做学问的方法,要自己摸索。我后来一琢磨,这不就是“学徒”嘛,不是“学艺”,而是“偷艺”。后来也就自己看《辽史》《金史》,有问题就去他家里请教。

我再补充说一点事。陈述先生 1929 年考大学,既考了北大,也考了北京师范大学预科,他为什么选了北师大,不是北大,现在有的文章说陈述先生特别崇拜陈垣先生,所以上了师大而没去北大,不是这么回事。陈述先生当时从中学考大学,不知道陈垣先生这个人。他父亲是个小学教师,知道北师大有个陈垣,北大有谁他不知道。陈述先生两边都考上之后,他父亲告诉他,北师大有个陈垣先生挺有名的,你要不就跟他去学吧。这些都是陈述先生亲口对我说的。

(下转 6 版) ➡

李锡厚,1938 年生,辽宁沈阳人。1963 年 8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,分配到黑龙江教中学,1978 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辽金史专业研究生,师从陈述教授,1981 年 10 月获硕士学位。1981 年 11 月至 1987 年 3 月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工作,1987 年 3 月至今在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。主要研究方向为辽宋金史。